

216/06

兴仁文史资料第二辑目录

- 一、投入革命斗争初期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赵怨吾（1—16）
- 二、忆舫舟……………王相犹（17—27）
- 三、兴仁县少数民族概况和建制沿革初探……………
……………孔正祥编述（28—40）
- 四、兴仁县少数民族概况……………张盛昌（40—47）
- 五、欢乐的“火箭节”……………
——记大兴寨打火箭的来历……………张盛昌（47—49）
- 六、兴仁县解放前历任县长简介……………孔正祥整理（49—55）
- 七、辛亥革命后历年盐米价记闻……………张正兴（55—58）
- 八、黔西南公路交通散记……………李锐舟（58—60）
- 九、修安八路贪污民工款项案记实……………张正兴（60—95）
- 十、李衡璋贪污纳贿片断记闻……………张正兴（65—67）
- 十一、漫话毒品————鸦片烟……………张正兴（67—71）
- 十二、匪首贺松高的覆灭……………翁国典 李锐舟（71—75）
- 十三、兴仁天主堂今昔……………黄茂才（75—79）
- 十四、几点补充……………桂朝相（79—83）
- 十五、兴仁八景咏……………张俊颖等（84—87）
- 十六、征稿启事……………县政协（88—89）
- 十七、补充材料……………县政协（89—）

投入革命斗争初期的片断回忆

赵 怨 吾

一九四九年冬，国民党的法西斯黑暗统治和“四大家族”的残酷剥削已经土崩瓦解，革命风暴席卷全国，大部份国土已经解放。时兴仁专署专员、黔西南绥靖司令谭本良，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，顺应历史潮流，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一日通电各县，毅然率众起义。这一闻名全省的兴仁地区起义，曾为和平解放贵州起了重要作用，作出了积极的贡献。我当时身为团副銜并兼任兴仁县政府民政科科长，对于革命起义是满怀喜悦和衷心拥护的，并为投入了革命斗争，实现了平生宿愿而感到无限幸运。

一九五〇年是起义后的头一年，也是我新生的第一年，那时节，情况复杂，百废待兴。我在党的领导下，或多或少地做了一些工作，现就回忆所及，概述于次。由于见闻和认识水平有限，很难顾及全面，仅是一鳞半爪，因而错缺难免，敬请批评指正。

兴仁县解放委员会成立

革命起义宣告了旧政府的灭亡，起义后不能再用兴仁县政府这块招牌了，因此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，兴仁县解放委员会应运而生，并刻制了一枚木质印信。

兴仁县解放委员会原计划是以旧县长张增复为解委会主任，以地方上有名人物若干人为解委会委员，可是所谓的有名人物没有一个前来就职的。个别来的，如潘家庄的李覲文（解委会付主任），也不过进城打个照面，尔后就避开了。因此，解委会名不符实，形成表面上是解委会，实际还是旧政府，正如俗话说的“换汤不换药。”

解委会做了些什么工作？第一是清理手续，准备移交，其次是应付各方面的日常杂务。起义后所谓国军328师奉命调贵阳，我是解委会的民政科长，去滥木厂（现回龙）催征粮草，供应军需，直至328师全部出境后，才回城过春节。

党的办事处

原在兴仁专署任职的刘谿铸和家住解中路的王进之，都是中共地下党员。起义后，他们才挂上钩，尔后公开露面，在民主路街口原伪县党部内成立了一个办事处。由于没有挂牌子，没有出通告，我们基本上不知道其中情况，后来才听说是五兵团办事处。（注：办事处主任刘谿铸，付主任王进之）。

办事处成立后，曾通知解委会，以后无论发布什么文件，都要先送办事处审核，同意后才能生效。

有一天，我拿一份普通公文去审批，只见刘谿铸在写什么东西，我把文件递给他，他草草一阅，提笔批上“同意刘”三个字。当时、我想这样办行吗？但又不便请教，只好转来交差。后有经验的同志告诉我，共产党人办公就是这样

的，这位姓刘的是个负责人，经他批示“同意”并写上个“刘”字，比国民党盖关防还有力，尽管放心。

兴仁县人民政府的成立

大约是一九五〇年三月间，有一伙同志前来解委会，有穿黄军装的，也有穿灰工作服的。我们在办公室热情地接待了他们。他们中有位同志指着张俊向我们介绍说：这一位是张俊同志，是省府派来的兴仁县县长，今天前来到差，接收兴仁县政权，成立兴仁县人民政府。我们热烈鼓掌，表示衷心的拥护。

接着，张俊同志宣布：

宿国有同志为民政科科长，负责接管民政科；

张子印同志为财政科科长，负责接管财政科；

何洪同志接管文教科（没有明确职务）；

朱宇民同志接管建设科（没有明确职务）。

随后，各科立即开始办理交接手续。

对于接管这是早已预料中的事情，并早有所准备。因此，有关人员立即进行移交工作。最初我们心中忐忑不安，不料工作却进行得很顺利，不到两个小时，我也就把民政科的手续全部移交清楚了。

旧县长张增复见我把手续移交清楚了，高兴地和我握手，并悄悄地说：“谢谢你”。我说：“我是对人民负责，不是为你服务，用不着你来感谢我。”

说实话，我认为共产党人真正是大公无私的，不会吹毛

求疵，不会敲竹杠。否则，象张增复这样的县长就不会轻松愉快的下台。张增复在贵州当了五、六任县长，哪一任交御没有遇到困难？有一次甚至投进了监狱。因此，也难怪他要前来感谢我，但实际上我毫无替他尽力的意思。

不久，人民政府的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了，王进之前来担任县人民政府的秘书，李金印接管了兴仁县警察局，后改为公安局，李担任局长。刘镕铸兼代税局局长。各区是：刘振洪为第一区区长；母凤阳为第二区区长；崔贤增为第三区区长；~~喻文祥~~为第四区区长；~~杨汉德~~为第五区区长。

刘镕铸和张俊县长对房居住，听说他是中共兴仁县委书记，但大家都叫他“刘政委”，他头上戴有“八·一”帽徽的军帽，的确也象军队中政委的样子，有什么事，他不直接和我们说，总是和张县长说后才告诉我们，就是我们共同在一起坐着都是如此。还有一个刘廷福同志，专办党务，显然与众不同。所谓的中共兴仁县委，最初只一位书记和一位干事在办事。

实行供给制和薪津制

解放初期，由于财政有所困难，国家对职工的待遇，有供给制和薪津制之别。一般是老干部都享受供给制，新干部享受薪津制，但也有少数新干部也享受供给制待遇。

薪津制，最初宣布每人每月在一百至一百五十斤大米价开支。头月我评得140斤，第二月领导上改为150斤，过了两个月，领导上又决定每月给我384斤。无论领多领少，我认为这比旧政府让大家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好得

太多了，几乎是天壤之别。特别是当时物价非常便宜，生活过得好，六元一月的伙食，吃得大家都满意。

望脚伏击 散兵缴械

一九五〇年二月，湖南陈明仁、程潜部队起义后，有一部份军政人员携械逃至安龙，已发觉他们将要通过兴仁。当时才起义不久，不能容许他们前来，这对维护社会秩序和安定民心是十分必要的。因此，解委会派遣起义的保安十一团前往望脚占领有利山头埋伏起来，当他们进入包围地段后，派人通知他们，徒手通过兴仁是可以的，必须放下武器才能安全通过，当初他们不肯，尔后看到山上都有部队，才勉强同意放下武器，但有些人把武器扔进河里或稻田里悻悻而去。县里接待了他们的头面人物，还请他们吃了一顿便饭，表示歉意。他们只有苦笑而已，这在当时叫做“公了公，私了私”。

土匪攻城

一九五〇年四月，起义的328师已调贵阳和保十一团已调贞丰整训后，兴仁县城里的解放军不多，建制部队只有一个连，将其他军事人员算上，也不会超过三百人。这一情况被土匪摸清了，特别是兴义黄草坝一度被土匪占领，三月十一日二七二师师长余启佑在调盘县整训时于青山叛变等情况，更加助长了土匪气焰，终于发生了土匪围攻兴仁县城的事件。

当初据报土匪分北、西、东南三路合围县城，县城里有

久经战斗的指战员，基本上没有把土匪的轻举妄动放在眼里，只派了少数解放军占领了西门外的一个碉堡和真武山等几个高地，城墙上只有少数人看守。所担心的是怕城内有内奸，万一放火捣乱，那就麻烦了。因此，县里规定家家户户必须把水缸装满，凡能盛水的器皿，如脸盆等都应装满水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另以开会为名，把谭本良等旧军政大员以及一些“有名人物”集中在县府里，采取保护措施。县里还规定，干部职工家属必要时集中到县府，万一土匪进城了就转移到大楼上，在大楼的南北两道楼门口各备手榴弹一箱，派两名解放军各守一个门口。布置就绪后，张俊县长统统到外面督导一切去了。

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黎明，西、北方响起了零碎的枪声，尔后西南边的枪声越来越密，显然已经开火了，防守西南边的解放军沉着应战，只见蜂拥而来的人中多数背着背箩，手中并无武器，则不忍以机枪扫射，就用小炮“通、通”地打了两炮，土匪则纷纷溃散，解放军便追击，结果抓获六十四人，一问都说是来县里背盐巴的，并都是些贫苦农民，经过训导，则统统释放回去了。在西南边开火的时候，北面 and 东南面却毫无动静，是何原因呢？后来才知道，是因为住巴铃的教导队得到土匪攻城的消息后，即整队前来应援，土匪知道这一情况后，闻风而逃，消声匿迹了。

县府里的守备事宜统统归我负责指挥，在西边的枪声密集时，有刘××出室走动，我问他：“到那里去？”他说：

“要到大门口的墩子上看看”。我劝他，“谭老专是有经验的，你最好向他学习，乖乖地回屋里坐到。”他似乎有些不耐烦，尔后看见我披着的大衣里面挂着一支步枪，他才明白

是什么一回事。

由征粮剿匪转入剿匪征粮

一九五〇年二月，省军区就下达了有关征粮剿匪的指示，当时的公家仓库空空如夜，市面上没有一个粮店，只有少数农民出售部份粮食，基本上解决不了人民的需要，人民政府面临的问题，首先是国家职工的吃饭问题，其次才是匪患问题，因此，大约在四月底，县里组织了两个“征粮剿匪队”，一个以王贵堂为队长，一个以张增复为队长。我在张增复队为付队长，我们队在军分区供给处某处长的领导下，开赴现在的雨樟区去进行征粮剿匪工作。

乡间的大宗粮食早已被地富疏散窖藏起来了，地富潜伏在群众中暗中窥视。征粮工作队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宣传征粮的办法，但群众沉默寡言，爱莫能助。因此，征粮工作遇到很大的困难，工作很不顺利。为了查清原因，摸清底细，不得不在大瓦房中去进行“探望”，不过是看看囤箩里边有没有粮食而已。于是“征粮队翻箱倒柜”的谣言四处传开，并传到县里。县里的领导闻言立即召集我们带队的回城来，接受新的任务和党的教育，领导上明确指出，前段以征粮为主，剿匪为辅，所以遭到重重困难，群众发动不起来，工作难以开展，今后要以剿匪为主的方针去征粮，只要消除了群众怕匪的心理状况，工作必然就顺利了。后来的剿匪征粮工作实践证明果然是这样。

共产党人是遵守政策的模范

征粮队到鲁础营后，住在一所大瓦房里。殊不知这是马

瑞的家。马瑞是与罗盘区游击队有联系的人，又是旧政府仓库的负责人，因为粮食被游击队取用了许多，因而被旧政府逮捕，后被谷正伦来电指令枪毙了，当时的县长就是张增复。还有一说，马瑞家为了营救马瑞，曾向张行贿，张已得到一部份贿款，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，谷正伦来电要毙人，张只得照办。这就使马瑞家更寒心，人死了还要花钱。现在见到张来到家中，当然更加气愤至极。群众经过一夜的酝酿，第二天就集会要求张增复出来交待问题，情绪激昂，气氛紧张。当天张俊县长也在鲁础营公干，对此情况感到左右为难，只好打电话向夏专员请示。

夏专员复电说，群众是正确的，但张增复是一个起义人员，党对起义人员的政策是“既往不咎”，把他交给群众去处理，是违反政策的，当前这样办更不恰当，最好把张增复调走，把问题缓和下来，等待以后再说。

根据夏专员的指示，张俊县长决定将张增复和王贵堂对调，王贵堂当时在交乐。当晚半夜后，是一个暴风雨的深夜，在雷电闪闪，大雨如注的情况下，我们十几个人冒雨将张增复送到交乐。

不久征粮队到雨樟工作，一天驻军要我去接电话，是县里叫把所有起义人员调回城去，我问：“我去不去？”回答：“你不必来。”

征粮队是由起义人员和社会力量组成的，仅有少数解放军担任分队长职务，掌管政治思想工作。经过多少时的剿匪征粮，有些社会力量以各种原因或则请假或不辞而别地走了。将所有起义人员调走，使我就成了“光杆队付”，我随后便去与驻军联系，他们同意由我自己决定去留问题。后来我独

自一人，冒着危险，回到了县城。见到张俊县长后 他对我说：“调旧职工回来，是要送他们去贵阳学习，别无他事”。我要求同他们一道去学习，张说：“领导上已经研究决定了，把你留在县里，边工作、边学习就行了，不必去贵阳。”他对我的归来没有说什么。

代理大同乡乡长

兴仁县人民政府原来已派林贵芳同志为大同乡（现龙场）的乡长，由于林是本县人，大同乡有许多沾亲挂戚的人，他们对林不仅不予支持，反而横加阻挠和干扰，使林感到十分棘手，工作上困难重重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大约是在五〇年的六、七月份，县政府决定派我去代理大同乡乡长，林为付乡长。

当时我想到祖祖辈辈没有谁干过乡长、保长之类的事，思想上有所不通，后有人劝我说：“人民政府的乡长跟国民政府的乡长有所不同，现叫你去是由于形势的需要，在今后一定条件下，你想当乡长也是不可能的，当前不过是代理而已，还是服从组织分配，立即前往完成任务要紧。”我认为言之有理，就去大同乡工作了。

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努力征粮，争取在秋收以前基本上完成上年度的粮食扫尾工作。我们的人数不多，只有我和林贵芳及分区派来的一个同志。有个戴眼镜的叫刘富奎，他说“刘政委派我来乡公所工作”，我让他掌管经济，赶场天还搞数量不大的税收。

到差后不久，我召集原来担任保长的人开了个会，向他

们宣传党的方针政策，还自己掏腰包请他们吃了一顿便饭，他们很高兴，表示回去后立即行动，保证基本完成任务。

我另外还召集龙场一带的群众开了一个大会，我在会上说我是异乡人，不是前来做官，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来为人民服务的。并说我带有武器和炸弹，不怕土匪谋害，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，另外我没有父母儿女的牵挂，我有信心和决心坚持工作，不怕牺牲。希望还未完粮的火速完粮，共产党是为人民谋幸福的，我们完粮纳税就是支持共产党的具体表现，是光荣的，……

两个会的效果都很好，很快就纷纷把粮食送来了。同时，原有的那种“风声鹤唳”的紧张气氛也有所缓和了。虽说时间不长，但征粮工作还是搞得不错的，城里每次派人来领取粮食，都是满载而归，没有空手回去过一次。

八、九月间县里来电话，要我回城仍然担任建设科付科长，大同乡仍由林贵芳主持。

再到大同乡去

有一天张俊县长找到他屋里说话，县委书记刘镛铸早已在那里等着，只见他俩愁眉不展，忧心忡忡地望着我，我从他们的表情上看出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了。坐定后，张县长才说：“大同乡发生了问题，军分区警卫连已经开去那里了，经领导上研究决定派你再去大同乡维护人民政权，潘家庄的武装班现在城里，由你带去大同乡，无必要时，再让他们转回区里去。另外，派富有斗争经验的两名南下老干部随你去大同乡工作。为了加强力量，请分区写个介

绍信，拨警卫连的一个排归你指挥。情况紧迫，立即出发。”这时已是下午两点左右了。随后我们就出发了，当走到长耳营附近时，恰逢分区警卫连开拔回来，我把分区介绍信给连长看，他边看边摇头。我问他：“怎么样？”他说：

“分区首长不了解具体情况，才作出这个决定，我想回城向首长汇报请示后再决定行止。”我问：“部队呢？”他说：

“暂时就地停止待命。”后又问他有关大同乡方面的情况，他不肯详说，甚至可以说是守口如瓶。

我当时认为，进城汇报请示来回得几个小时，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到大同去的，不如趁早先行，解放军来最好，不来也无可奈何，其他同志也没有意见，于是我们就直奔大同乡而去。

到达大同时已日落西山了，男女老少不见一个，到乡公所一看，只见林贵芳和两个区武装兵的尸体歪东倒西的摆在地上。

我去王××家请他帮我们准备一顿晚饭，他说一粒粮食都没有，只有将新鲜包谷来弄。我们大家正在忙做晚饭时，有个民兵跑来喊我：“乡长，还不快走，火杆土匪来了。”我说：“跟他们拼杀怎么样？”他说：“来一营人差不多。”他说完就匆忙地朝梅子冲方向溜了。在这种敌我悬殊的情况下，我只好带领大家离开。但又想，难道把区武装班再带回城里去吗？我认为不如先去潘家庄再回城，免得土匪跟着我们，影响附近秩序。

那是在久雨后的一个漆黑的夜晚，道路泞泥，非常难走，稍不在意就会摔跤。我的手枪跌落进牛踩出的泥坑中，爬在地上摸了半天才将手枪取出来。走到巴巴铺时，的确疲劳不

堪，便在那里歇了。

第二天早晨才到潘家庄，该处住有一个武工队，但情况也是很紧张的，区工所的武装兵和职工，每夜都进碉堡睡觉。和我前去的同志要我立即进城，我没有同意，只让他们先回城了，我暂住潘家庄，原因是我心里有这样的一个打算：一、白白的跑出来受一场苦太不值得，必须办点事情才行；二、林贵芳等三人是革命同志，让他们挺在地上无人管是问心有愧的，应该设法解决掩埋他们的问题。

我请李家派了一个胆大心细的人到大同乡去，找当地有声望的人赊两具棺材将两个区武装兵掩埋了，另外，林贵芳是城里人，请他们雇人把林的尸体抬进城里去安埋。并表示，所有一切费用我个人以人格担保将来如数还清。

尔后从大同来了几个老者，一则看看我，主要的还是来问清对林贵芳三人如何安排。我当面表态说清后，他们就回去照办了。赊的两口棺材，一具36斤川盐，另一具34斤川盐，后来都由县财政科如数付给了。并没有超出国家规定的标准数目。林也在城里开追悼会后安葬。

张县长不了解情况，最初对我在潘家庄耽误有所不满，当我把情况向他汇报后，才没有话讲。

大同乡公所当时除林贵芳外，还有一名干部叫刘富奎，另外有三名区武装兵。在土匪袭击乡公所的当天，刘富奎借故请假走了。林和两名区武装兵在战斗中牺牲了。还有一名区武装兵比较年幼，被土匪俘去，不知所终。刘富奎的行踪是可疑的，但县里后来只叫他写了一份检讨了事。

兴仁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

一九五〇年九月，召开了兴仁县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，出席这次大会的人数达千人左右。大会召开期间，城里张贴了醒目的大幅标语，机关张灯结彩，县城面貌焕然一新，以兴仁有史以来可谓盛况空前。

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贯彻执行五大任务——征粮、减租、退押、清匪。反霸。

会议还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，选举了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政治协商委员会。

刘镕铸是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，我是以人民政府代表的身份出席大会的。协商委员会由十三人组成，除刘镕铸和我以外，其余的是实行差额选举出来的。如妇女委员一人，候选人两个，选票多者当选。

选举结束后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，腰鼓队和儿童团载歌载舞地涌进会场，热烈祝贺大会成功，并向委员们献了花。

我在主席台上戴上大红花

会后竟有“赵××挂花了”的说法不胫而走，一下子传遍开来，有不明真象的人还以为我负伤而前来探望。因为旧习惯称军人负伤为挂花，有的地方叫挂彩，所以，他们误会了。我从来就不迷信，但这次，讹传在我思想上不免有点苦闷。以讹传讹真可怕呀。

顽匪夜袭工作组

一九五〇年十月初，兴仁县为了贯彻执行“五大任

务”，组成了五个“五大任务工作组”。我奉命担任第三工作组组长，工作组成员是：陈英（军大学员）、单衍德（南
不工农干部），熊泽，雷高翔（兴中学生），杨云仙、××
×（街道妇女）、徐家祥（县府勤务兵）、黄××（农民），刘富奎（暗藏特务，后来在兴义自杀）、李忠（湄潭
保警队长，起义后叛变。）

我们第三工作组的区域，是自县城北门口起向北伸延至杨家山、四方地等处，包括两侧村落，如扒古等地。工作组驻地设在大桥河岑瑞庭家里。由于区域广，情况复杂，所以配备的武器比其他各组都强，有手枪三支，步枪七支，轻机枪一挺。

武器是要人来掌握的，人不行武器再多再好都等于零。从工作组的成员来看，这些武器能否发挥效果（特别是轻机枪）的确是令人担心的。尤其是第一工作组发生了女同志因枪走火打伤一个男同志的事后，我思想上的顾虑，更加沉重如山。

在当年的情况下，增加人员不可能，调换人员说不得，只有服从组织分配，千方百计地去进行工作才是唯一的办法，因此，我和陈英、单衍德同志曾经开过秘密小会，共同决定了三条：1、刘富奎是近视眼，不要他站岗放哨；2、不让李忠，刘富奎单独行动；3、李忠站岗只能站门口的岗。

话虽如此，但只有老单同志忠实执行，陈英年纪轻，玩心重，我一进城他就去找同学玩，而老单同志是个农民干部，性情温和，为人忠厚，警惕性不高，因此，使坏人阴谋得逞，终于发生了土匪偷袭工作组的不幸事件。

十月某日，当天我进城开会，老单进城领供给制所发得的一些物品先回去了，开完会时天已经黑了，在我回去前就有人劝我：“路上豺狗多，地形又复杂，万一碰上坏人就危险了，不如明天起早点回去妥当些。”我也认为情况的确是这样的，但心想怎能只顾个人安危，而把工作组忘掉？万一工作组发生意外，我这个组长也责无旁贷，还是冒险回去为上策。

我只身连夜回到大桥河后，立即召集大家开会，布置了今后的工作。待散会时已经半夜过了。

我和陈英，老单三人是在厢房楼下睡，其余男同志在厢房楼上睡，女同志在房主正房睡（当夜有个女同志进城去了）。

我还未睡着，院子里枪声响了，头一枪就把我左腿的大腿骨打炸了（因我的床离大门不到两公尺），我问是谁站岗，陈英说是李忠，我喊李忠，无人答应。当时我想起床，但身子已经不能动了，只好用手枪跟院子里的土匪对打，我向外打，土匪向里打，其实黑洞洞的，谁也看不清谁，简直象开玩笑一样。

老单同志下床后，走到窗户后面用手枪向外射击。听得外面有个土匪叫“老单”，我着了，”有个回答说：“打不死就不要紧。”老单继续战斗，尔后中弹倒地光荣牺牲了。可怜他当天进城领到的物品还未曾用上哩。

我们住房的墙是用石头垒的，子弹打在墙上火星四溅，碎片乱飞，不知是子弹还是碎石片把陈英的头击伤了，他就沿着我的床边摸到隔壁去了。

楼上没有人开枪

十响手枪和轻机枪当天被徐光祥进城时带走了。我身边只有一支大拉八，老单用的是日造小手枪，效果不大，即使这样，可土匪还是被我们堵住，不敢贸然进屋。他们先爬上楼去，把枪抢了，对人没有采取什么行动。后来才知道黄××死在楼窗口一个木柜子里，刘富奎肩上负了一点轻伤。

大约半个小时后，我的左手食指也受了伤，手枪也被打落，因流血过多，逐渐昏迷过去。尔后土匪进屋，将我的被子扯下床，可能是看到床上地上都是血，以为我死了，由于他们做贼心虚，拣起手枪就鸟兽散了。

后来查清这次不幸事件，是土匪串通李忠所制造的。当晚李忠站岗，他把土匪放了进来，并把枪送给土匪，然后才跑回巴铃老家去。第二天早上，李忠就被母凤阳区长在李家楼上捕获，尔后在大桥镇压了。

当天黎明时，张俊县长带着公安人员、医生和武装人员赶到。及时给我打针服药，进行抢救，并立即送到军分区医院进行治疗。

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后，李生德院长热情地和我说：“老赵同志，安心休养吧，今天我敢保证你不会死了。”

我笑着问他：“那么今天以前呢？”

他说：“今天以前谁也不敢保证死活。”

我激动地说：“感谢您，感谢毛主席，感谢共产党！”

李院长笑了。